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三十二辑

内蒙古近现代 王公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编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内蒙古近现代王公录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三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新华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7.25 字数:165千
1988年12月第一版 印数:1—8,000册
国内统一刊号CN15—1081

前 言

蒙古史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是世界性史学学科。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了蒙古大帝国，这对中国的历史，对世界的历史都给予了重大深远的影响，这也就是蒙古史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要原因。

成吉思汗的武功文治，与他实行的领户分封制是分不开的。当初这是以便于征战行动为主要目的的十进位制。设置十户、百户、千户，千户之上设置万户。之后，随着领土的扩大，对其诸子、诸弟以及勋臣进行了领地分封，形成了诸汗国、诸部落，其后裔则成为世袭贵族（台吉）。

清初，努尔哈赤沿袭蒙古的十进位制，将其基本军事单位以十人编一牛录，设一管带，名为牛录额真（额人真为主人之意），后来由于战争需要，牛录扩编为300人，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亦译甲兰、甲浪），设额真一人，每五个甲喇编为一固山（汉语译为旗），设额真一人。初期只有四固山，分别用黄白红蓝四色旗帜区别，称为正色四旗；后来又增设四固山，分别在四色旗的周边镶上红边或白边，称为镶色四旗，这就是满洲八旗制度的由来。八旗制度是兵民合一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组织，旗管

辖固定的地域和人丁，既是部落联合组织，又是统治人民的政权组织。

蒙古各部归附之后，清廷为了削弱蒙古诸部势力，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仿照满洲八旗的性质和组织形式，建立了蒙古盟旗制度。将蒙古诸部分置若干旗，小部为一部一旗，大部则分为数旗。如敖汗部为敖汗旗；鄂尔多斯部，一部分置七旗；科尔沁部分置左翼三旗，右翼三旗。旗的基层组织为苏木（相当满洲八旗之牛录，汉译为佐），几个苏木之上设一扎兰（相当满洲八旗之甲喇额真，汉译为参领），旗设札萨克一人，拥有行政、司法、税收和军事管辖之权，但必须严格遵行清廷的一切律条和旨意，并定期赴京值守年班。清廷对各旗贵族大加封爵，爵位设有六等：依次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此外还有台吉和塔布囊，二者又分一二三四等，爵位可以世袭。每旗除札萨克王公外，其他王公称为闲散王公（闲散王公一般不参加旗务管理，但是他们享有贵族荣爵特权，有封地，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的出任协理台吉或管旗章京）。他们享有清廷赐与的种种权利，成为各旗的封建统治阶层，在清廷恩威并举，羁縻笼络之下，部落之念日渐淡薄，只知对朝廷感恩戴德，俯首听命。

为便于监督、稽察各旗动态，以会盟的形式，在旗之上设立了盟。内蒙古全境共设六盟（索伦八旗、察哈尔八旗，察哈尔四牧群，归化城土默特二旗，依照满洲八旗组织例不设盟，不任札萨克而任旗、群总管，也不封爵，阿拉善旗及额济纳旗，虽任命札萨克，但未置盟）东部四

盟、西部二盟。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于本盟各旗的札萨克王公或闲散王公中选任，由理藩院请旨简放，通常为终身职，但不世袭。会盟时间与地点由理藩院指定。

盟旗王公制度对维护满清的统治，巩固国家的边陲，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使蒙古民族长期处于文化、经济的封闭落后状况，从而延缓了蒙古民族的发展进程。盟旗王公制度从清初一直延续到解放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彻底清除了维持300余年的盟旗王公封建制度，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以蒙古民族为区域自治民族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内蒙古自治区，真正使蒙古族人民走上了团结发展的康庄大道。

盟旗制度及其代表人物——王公，他们是蒙古汗权的遗留象征，又是满清王朝统治的产物。他们依附于清王朝，既是“外藩王公世爵”，又是内蒙古地区的实际统治者。300余年中，内蒙古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王公，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位尊权重，声名显赫，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有些王公积极参加了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但也有些王公进行了分裂祖国的背叛活动；有些王公多方学习国内其他民族和国外的先进文化、科学和生产技术，寻求振兴民族的维新道路；但也有些王公平庸昏聩，甚至荒淫暴虐，成为统治剥削蒙古人民的“暴君”；清末以至民国以来，有些王公顺应历史潮流，积极翊赞共和，维护祖国统一，但也有些王公希冀复辟清王朝、维护封建王公制度，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倒

转；有些王公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顽固抵制人民解放事业，但也有些王公深明大义，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总之，他们在中国和内蒙古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种种不同的角色，对中国和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影响。

为了反映内蒙古近现代历史上王公制度的情况，并使人们对一些著名王公情况有所了解，也为了向史学界提供资料、素材，从而对蒙古史的研究尽以绵薄之力，我们编辑、出版了《内蒙古近现代王公录》一书。书中辑录了内蒙古近现代历史上较为著名的14位王公的史料，这在内蒙古众多的王公中仅是很少的一部分。据粗略统计，内蒙古51旗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袭任札萨克王公的就有130多人，闲散王公就为数更多了。我们打算今后继续征集、编辑这方面的史料，并热切希望了解内蒙古近现代王公历史的各方面人士积极供稿，协助、支持我们完成这一富有意义的工作。

限于水平，本书不足之处尚望广大读者、知情人士和历史学者批评指正。

我们聘请了包国忠同志编辑本书，在资料的征集、编辑、校对全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富有成效的贡献，在此，我们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8年12月

目 录

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	吴恩和 邢复礼 (1)
附录：贡桑诺尔布传·····	纳古单夫译 (16)
达尔罕王生平事略·····	博尔济吉特·温都尔涅夫 (30)
阿拉善王达理扎雅生平·····	罗永寿 张文第 张世杰 (50)
僧格林沁的传人——伯彦讷谟祜及其儿孙·····	达瓦敖斯尔 (89)
从福晋到护理札萨克——忆二姐奇俊峰·····	卓力克 (98)
我所知道的宾图王棍楚克苏隆·····	博彦满都 (129)
图布升吉尔格勒生平简述·····	奇宝玺 (135)
巴林郡王色丹那木扎勒旺宝一生·····	彭祝三 (142)
敖汉亲王勒扎勒仁钦旺布及其家世轶闻·····	鲍玺 (147)
敖汉贝子府和德王·····	鲍枫珊 (159)
我是怎样立为小王子的·····	鲍绳武 (171)
科尔沁右翼前旗乌泰王叛乱始末·····	博彦满都 (174)
附件一：乌泰王发布东蒙独立宣言及扎鲁特左旗对 乌泰的援助·····	(181)
附件二：乌泰王向俄国借款始末·····	(184)
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	李景唐 (189)
内蒙古近现代札萨克王公名录·····	包国忠 (201)
蒙古盟旗王公制度行政组织系统表表·····	(223)

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

吴恩和 邢复礼

贡桑诺尔布，别号乐亭，又号夔龠（kuīān），系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济拉玛的后裔，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性极恬静，平易近人，通晓蒙、满、汉、藏等各种文字，喜吟咏，著有《竹友斋诗集》流传于世；好属文，工书法，擅长绘事，求知欲很强。有人说，贡桑诺尔布（以下简称贡王）一生手不释卷，实非虚语。

贡王青年时代在地方上办了很多应兴应革的事情，政绩显著，开朔漠风气之先，也极为旗民所称道。袁世凯窃国后，听到贡王在旗内兴学练兵的举动，恐其“图谋不轨”，屡电召京，授以蒙藏事务局总裁之职，并赐邸于景山之阴（即北京太平街王府），从此长川住京，不亲旗政。袁世凯称帝时，又被位于“上卿”之列，晋爵亲王，名为倚重，实即监视。贡王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不但是蒙古王公中的翘楚，也不失为当时的一位风云人物。对于这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问题，自有治史家们专门去研究。笔者都出身于喀喇沁右旗，对于贡王的生平事迹，逸闻轶事，多所见闻，现综述于后，以为史家参考。

家庭及所受教育

贡王的父亲叫旺都特那穆济勒，他除了喀喇沁郡王及卓索图盟长等本兼各职外，因娶清朝皇族礼亲王的妹妹为福晋，又是“御前行走”，每年都要晋京值班，和清朝的王公权贵过从甚密，因此也熏染了些很恶劣的习气。酷嗜京剧，不惜巨资在王府的偏院内修筑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戏楼，额曰“燕贻堂”。并由北京延聘京戏教师、琴师数人，教授新选拔进来而又不谙汉语的旗民子弟。学艺还未臻熟练，就强迫他们粉墨登场，引吭高歌，这位王爷则正襟危坐地去欣赏，听出有走腔或吐字不清的地方，就勃然震怒，把演员拉下台来，痛打一顿，以示薄惩。有一个叫六十六的演员，饰京剧《芦花荡》中的张飞，在道白唱名时把张飞的“飞”字念为“灰”字的音，因一字之错，竟被这位魔王抽了几十黑蟒鞭，又把他的眼珠刺破，揉进石灰，使这个假张飞双目失明。

这位王爷还有一个十分残忍的怪癖，就是在每逢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把一至二名奴婢打得头破血流，这才捋髯大笑，浮一大白。

他还笃信喇嘛教，每日清晨都要念一遍藏语经卷，这在他生活中好象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大事。可是在念经时仍然用手里拿着的法器，痛击近侍的头部，念得快，打得更快，象是击节一样，看到血流如注的时候，他才罢手。对于王府内上下数百名差役，每天每人仅发给两木杓小米饭，永远不让他们吃饱。甚至连大小便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诸如此类的残暴行为和毫无人性的清规戒律，不一而足。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贡王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不会受到什么良好的熏陶。但他这位野兽一样的父亲，却非常注意儿子的教

育问题。贡王6岁那一年，由山东聘请一位姓丁的举人为启蒙教师，同时还让他从师喀喇沁中旗蒙文学者伊成贤学习蒙、满两种文字。贡王的天资虽不鲁钝，但也并不象一些人恭维的那样“聪明绝顶”。由于他父亲的性情暴戾，课读颇严，他是朝乾夕惕，孜孜不倦，在十四五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和一些古典诗文，能写八股文，会作试帖诗，他父亲又令他从一位在西藏住过多年的喇嘛攻读藏文经卷，从一位河北省的武术家练习拳击和骑射。因此他在学问、品德和体魄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和教养。

贡王16岁那一年，与清肃亲王的第三女善坤结婚（即善耆之妹）。婚后仍在他的外书房着重练习写字和绘画，并研究音韵和词赋格律，同时整理他父亲所写的《如许斋诗集》的原稿。

听说贡王的婚后生活并不十分美满。这位肃亲王的女儿，自认为郡主下嫁，骄纵异常，对贡王视若草芥，不只是毫不尊敬，有时还横加凌辱，一切行动都要顺从她的意旨。贡王内心虽然不满，但慑于阉威，敢怒不敢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贡王的父亲旺都特那穆济勒病死，翌年春贡王晋京，正式承袭了喀喇沁王的爵位，时年27岁。回旗后，首先把他父亲时代的秕政尽行革除，解散了京戏班，遣送了梨园子弟；取消了每人每天两杓小米饭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减免了人民负担的无休止的差徭制，而改为定额制。长期在他父亲的统治下喘息呻吟的旗民，好象得到了一次长呼吸，旗民对这一位新王爷一开始就有了较好的印象。

兴学练兵，偷渡扶桑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贡王听到“帝后蒙尘”，八国联军侵入的消息以后，他知道满清王朝已不足恃，很想开辟另外一条道路，遂有了兴学练兵、发愤图强的决

心。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贡王晋京，会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通过袁的介绍，以优厚的待遇延聘了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的周春芳为军事教官，同车载归后，就由旗内选拔了一部分青壮年，把原有的王府卫兵及府内的青年差役，一并整编为正式军队，服装整齐，枪械精良，在周教官的新法操练下，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来这一支军队在保卫蒙旗治安、剿灭地方土匪中，都起了相当的作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贡王在王府的西院（俗称西衙门）开办崇正学堂，招收旗民的青少年及适龄儿童入学，有宿舍，有饭厅，有小型图书室，设备相当完善，一切都是免费。对于离家远而不愿住宿的学生，在上学时都用四套马车接送。

贡王自任校长，派管旗章京朝鲁（汉名汪良辅）为监督，并聘江南名士陆君略（浙江钱塘人）、钱桐（字孟材，江苏无锡人，北伐后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为总教习，长安（汉名邢宜庭）为汉文教员，富斋宝（汉名包景文）为蒙文教员，并责成陆君略和博彦毕力格（汉名汪国钧，字翔斋）编写汉文四字句蒙旗地理教科书。

贡王在崇正学堂的开学典礼上讲过这样的话：“我身为王爵，位极人臣，养尊处优，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可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我的旗民子弟入了学堂，受到教育，将来每一个人都会承担起恢复成吉思汗伟业的责任。”他又当场挥毫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学校正厅的明柱上，文为：“崇武尚文，无非赖尔多士；正风移俗，是所望于群公”，内嵌“崇正”二字，颇工整。陆君略、钱桐都交口称赞，认为他既为王爷，又为校长，应该有这样的口气。

光绪二十九年秋季（1903年）贡王又通过布利亚特蒙古族高木布耶夫的关系，由崇正学堂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德克精额、恩

和布林（汉名吴恩和，即笔者）、特木格图（汉名汪睿昌，即北京蒙文书社经理）、诺仍丕勒（汉名汪子瑞）等4人，送入北京东总布胡同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专攻俄文俄语。

这一年的冬季，由日本驻清朝公使内田康哉的介绍，贡王和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承武、肃亲王善耆的长子宪章等数人，各带仆从，未得清政府的许可，由天津私搭日本邮船东渡。此行除了参观正在神户开幕中的博览会外，并与日本朝野名流接触频繁，特别是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贡王访日期间，会见了东京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畅谈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引起他极大的重视。回国后立即着手创办毓正女子学堂，改修“燕貽堂”为校址，光绪三十年冬季，正式开学。入学新生约50人，王府内的侍女居多一半，贡王的妹妹七格格也入校学习。（七格格后嫁小巴林王色丹那木济勒旺宝）由贡王福晋善坤亲自主持校务，聘巴图散其尔（汉名伊宪斋）为蒙、汉文总教习，喀喇沁中旗宁姓女子为蒙文教员，又由北京聘请状元徐郙的第八女张夫人（从夫姓）为汉文教员。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福岛中将的介绍，又聘日籍女性河原操子（后称一之宫夫人）为日语、算术、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各门课程的教员。

贡王为了培养下级军官，在同年的冬季，利用他三叔父（俗称宫城三爷）在王府西面大西沟门的旧邸，设立了守正武学堂，选拔本旗官员子弟约30人入学。经福岛中将介绍，延聘了日本陆军大尉伊藤柳太郎、陆军少尉吉原次郎为正副教官，又聘能操日语的浙江钱塘人姚子慎为翻译官。学科用日本操典，由日本教官用日本话教课，操练时也要用日语口令，是完全日本化的一个军事学校。

贡王又别出心裁地由军队中遴选了乌尔固木吉、铁丹、纳木

格其等三名优秀士兵偷送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驻屯军的军营内，和日本兵一起学习器械体操和军乐。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让他们剪发改装。

贡王访日回旗后，设立毓正、守正两校时，延聘日本教官，用日语授课，完全采取了日本教育方式，通过这些，我们很清楚地看出贡王崇拜日本科技和注重教育的思想，表现出他有倾向日本的迹象。

贡王延聘的日籍教官伊藤柳太郎、吉原次郎是日本陆军当局在日俄战争的前夕，以教员身份派到喀喇沁王府的军事间谍。他们在贡王的优待和纵容下，进行过不少的间谍活动。在同一时期，北京的日本驻屯军也派出以爆炸东清铁路嫩江大桥为目标的两名“别动队员”，一姓冲，另外一个叫横川。他们由北京坐骡驮轿出发，经过古北口、热河，越茅金坝，一直到喀喇沁王府来找他们的同伙伊藤、吉原两个人，密谈了两日。贡王让他们下榻王府西福会寺（俗称西大庙），备极款待，临走时都给换了喇嘛服装，并派亲信辛占柱沿途护送到大巴林旗。巴林王扎嘎尔改派经文泰（汉名赵化民）继续送往哈尔滨，途中被东清铁路警备队发觉，立即逮捕，当场枪决。我们看到日本的某一杂志上曾刊登过这两个特务被枪决时的像片。日寇占领东北后，除在哈尔滨车站前立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冲、横川两烈士纪念碑”外，在喀喇沁王府的后山上也同样地建立了一座，解放后被当地人民拆除。对于贡王掩护日本间谍这一行径，永远是人们所不能谅解的。

贡王在这一个时期，还多批向国外选派学生，其中崇正学堂学生徐文明、白瑞（曾充国民党监察委员多年）被送入保定简易师范学堂；恩和布林、特木格图、巴达尔胡、太平等四人被派往天津，在北洋实习工厂学习织布、染色、制造肥皂、蜡烛、粉笔以及电镀、照像等技术；同时又从崇正学堂学生中选拔于启明。

乌勒巴图（汉名杨时芳）入上海南洋中学堂学习；派诺仍丕勒（汉名汪子瑞，曾充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阿拉塔（汉名吴子兴）、那顺乌勒吉、班达木吉（汉名霍岳南，曾充北洋军阀政府西北筹边使署参赞）阿拉金布（汉名郭皋轩）入北京陆军贵胄学堂学习。从守正武学堂选出温哲浑（汉名杨鼎臣，后为本旗管旗章京）、陶克托胡（本旗贵族二等塔布囊，汉名陶建华）等二名送入保定军官学堂学习军事；选送学生双柱（汉名吴尧臣，现为昭盟政协委员）巴音宝、六十五、吉里嘎拉等四人入北京测绘学堂学习测量；并由毓正女学堂中选出女生叶婉贞、吴秀贞入上海务本女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季，乘日本女教师回国之便，选派毓正女学堂女生何惠珍、于保贞、金淑贞（后与蒙文书社经理汪睿昌结婚）等三人，与河原操子同船渡日，入东京实践女学堂肄业。

河原操子归国后，贡王又由日本继聘当时为帝国大学讲师的鸟居龙藏夫妇分担崇正、毓正两校的男女主任教员。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天，通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的关系，派遣男生伊德钦、诺门必立格（汉名金永昌，曾任伪蒙疆政府交通部长）、恩和布林、特木格图、于恒山等五人先赴天津，由一日本人日高者率领，乘日本邮船“太信丸”至神户登陆，又乘火车到达东京后入振武学堂（振武学堂即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科）。贡王保送这五名学生留日时，并未得清政府的许可。已经入学的学生，如被清朝驻日留学生监督（当时的监督为汪大燮）发觉时，就有被遣送回国的危险。日本学校当局也注意到这一点，便把他们和安南留学生安排在一起，同起居，共饮食，并限制他们和中国留学生接触与谈话。

这几名留学生由振武学堂毕业后，本应按部就班地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由于清政府有不许蒙族学习军事的禁令，恐被发

觉，因此，除恒山一人因故中途辍学外，其他四名分别考入东京农科大学、千叶县医科大学、东京慈惠医科大学等学校。

办报刊、创邮电、开工厂、设商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季，贡王为了启发民智，宣扬新政，曾在崇正学堂内附设一报馆，每隔一天石印一大张，名曰《婴报》。并责成崇正学堂的师生源源投稿，除刊登些国内外重要新闻外，有科学常识、各盟旗的动态以及针对时局的短评等。由送报员送到人烟稠密的村落，大量散发，不收报费。

贡王因感到旗民中的文盲太多，又开展了相当广泛的旗民识字运动。他的具体办法是，用英文字母创造出一种简易的蒙文字母和拼音方法，先在军队中试行，逐渐推广到旗民中的男女老少。贡王的60高龄的母亲，也参加了这一个识字运动，据说由于她的带头，不到数月，成绩斐然，大多数人都具备了阅读报纸的能力。与此同时，贡王还拿出一批钱来，在北京购买了一批《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大部头珍贵书籍，在王府的西跨院开辟了一个略具规模的小型图书馆，专供各校师生和旗衙门内的行政人员阅读。

贡王又痛感本旗境内邮电不通，诸多不便，遂派人到离王府90华里的围场县接洽，取得县方的同意后，大量采伐附近各山的松树，贡王亲自督工，自围场县的克勒沟到喀喇沁王府，在长达90华里的线路上，架设电杆，使对国内各地的电报畅通，不复使人有边塞荒漠，内外隔绝之叹。他又由旗内选出精壮蒙人三名分为三班，徒步往返于北京、喀喇沁之间，递送邮件，并设邮政代办所及电报收理处等机构，派干员专司其事。

自邮电畅通以后，各校师生及旗民中的知识分子，大批订阅北京出版的报章书刊，使当地人民能大量地吸收到外界文化，文

风蔚然，盛极一时。

贡王又在王府东的坯厂子村（蒙语称平套海）设了一所综合性的工厂，内分织布、染色、造绒毡、肥皂、蜡烛、染料等各部门，聘天津北洋工厂实习回来的学生为技术员，又请一名天津工人为织地毯的老师傅，招收了很多蒙古青年为学徒工。

他又向北京的俄国道胜银行借银3万两为资金，在王府西八家村（蒙语乃门爱拉）开设了一家百货商店，名为“三义洋行”，委王府包依达（官名）哈莎巴塔尔（汉名金玉斋）、陶克托胡、博彦毕力格为正副经理，并由天津聘来一位高姓商人为助手，除出售综合工厂的一些产品外，由京津各地大量批发来蒙汉民所必需的洋广杂货。百货杂陈，五光十色，远至百里以外和邻近各县、旗的购物办货的人们，络绎不绝于途，当时之喀喇沁王府有“小北京”之称。对于丰富人民物质生活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贡王又派人到浙江购买桑苗数万株，经上海海运到天津，由天津装火车运到北京后，载以骡车再运到王府，在福会寺庙前和王府花园内，择地数百亩，广植桑苗，绿树成荫后，喀喇沁王府一带的养蚕之风遂炽。

日本驻北京驻屯军赠送贡王三十年式日本步枪100支，他把这批新枪全部发给军队和守正武学堂的学生，利用替换下来的旧枪，招募了旗内青年约20余名编为警察队，并在王府内设立警察局，置警官若干名，经常巡逻旗内各要冲，借以维持地方治安，数十年来喀喇沁王府附近各村落未受到一次盗匪的侵袭，和这些设施不无关系。

贡王对于改革旧制度方面，也不遗余力，例如改跪拜礼为鞠躬礼；并极力提倡新式结婚，在其学生举行婚礼时，一定在红纸上亲笔写“文明结婚”四字派人送去，表示庆贺。他很反对婚丧中的繁文缛节和铺张浪费。按照他的授意，崇正学堂的师生，组

成了一个专门研究地方行政和“参佐制度”的政治小组，定名为“崇德学社”。该社开会时，贡王有时也亲自参加，很坦率地倾吐他个人的见解。他非常憎恨地方上的参佐人员（参领与佐领）的墨守成规和贪污腐化。他还在崇正学堂内附设了一所政治训练班，培养从事地方行政的人材，想把老朽昏庸的参领、佐领逐渐地加以淘汰，用新的一代来接替。为了避免守旧分子的猜疑和情绪上的不安，政治训练班在表面上冠以师范班名义。

兴学练兵、庶政维新这一系列措施继续了两三年之后，由于开支太大，旗内财政收入已难以负担，在既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经费支绌的现象。为了筹措经费，贡王煞费了一番苦心，起初把府内所存的珍玩古董、名人书画、衣服什物等运往北京拍卖，但所得无几，尚不敷开支各学校教师一个月的工薪。他不得已遂在旗政会议上提出：拟将孟干沟及汤土沟的牧场荒地招募佃户开垦，以荒价收入弥补财政困难的提案。办理旗政的大员们，对于他的意见不予支持，当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的时候，有一青年堂官名阿拉麻斯鄂其尔（汉名赵鹤亭），力表赞同，并自报奋勇地愿意承办这一件事，贡王遂任命他为开垦员兼王府长史（即总管）。阿拉麻斯鄂其尔取得了贡王的信任之后，立即推荐他的好友苏达那睦（汉名苏子余，系贡王的同族）为旗度支部局长。

阿拉麻斯鄂其尔办理荒事还不到一年，就大大增加了旗财政的收入，解决了很多的困难，而他自己也修筑华屋，每天要请几十个喇嘛念经，杀猪宰羊，大吃大喝，俨然是一个暴发户。他这样侵吞肥己的贪污行为，被守正武学堂的学生揭发出来，贡王大怒，拟逮捕法办，没想到事前走漏了消息，阿拉麻斯鄂其尔偕全家老小远遁，经东蒙各旗辗转到哈尔滨落籍，在俄国人主办的《远东日报》馆充当蒙文编辑，客死他乡。贡王没收了他的房产充作王府卫队的兵营，由此而引起苏达那睦的不满，竟擅离职守